

◀ (上接4版)

如前所述,恩师西嶋定生先生对中国存续了两千年的皇帝支配的特质抱有强烈的关心。但皇帝支配的特质是抽象的。在皇帝—官僚—人民的关系中,究竟哪一部分能够展现这种特质?不同的问题设定,分析方法也就有所不同。而这个问题设定本身也因研究者而各异。

我自己也不敢夸口具体把握了汉唐间皇帝支配特质的大倾向。通览从西汉到唐代即位仪礼的变化,可以窥见皇帝和官僚变得更为紧密,也确实能说在宏观上,官僚支撑的皇帝的制度逐渐发达、精致化。但与对贵族制的理解也有关系,把握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与官僚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南北朝皇帝的样态,今后还要继续考察。

关于日本的天皇制,有许多课题现在也仍然讨论热烈。比如在导入中国律令体系以前古代日本的天皇制的样态是怎样的呢?律令制导入之后,又附加了怎样的中国特质?从武士政权登场的镰仓时代到江户时代,天皇权力又是以何种形式存在的呢?在中国除了武则天以外就没有女帝了,而日本则有几位女帝;对日本女帝特别是古代日本女帝的特性又该如何把握呢?

日本的天皇制直到今日依旧存在,在与中国对比的场合如何寻求天皇制的特质所在,这确实是非常难的问题。在这时候,如何理解在上述天皇没有直接统治的武士政权时代天皇和武士政权的关系就显得很重要。例如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每逢德川氏的将军换代,需要举行天皇任命征夷大将军的仪式,也即天皇将统治权委任给德川将军的仪式是必要的。换言之,德川氏将军本身要以天皇为媒介,才能获取全国的统治权。这与通过皇帝自身获得天命而主张自己权力的正统性的中国有着很大的区别。从这点来说,中国的皇帝祭祀,特别是郊祀(南郊)的意义十分重大。但是,中国在东汉时也连续有幼年皇帝,由外戚或宦官主政的情况频现。而在南朝,也能看到有很多少年皇帝登场,做出严重不正常的行为。日本在平安时代的摄关政治期,天皇也不参与政治了,而主持政权的藤原氏与天皇的关系,较东汉和南朝的情况也大不相同。故考虑到这些时代皇帝或天皇与实际主政者之间关系的特质也是很有必要的。

吕:金子先生如何看待佛

道两教对于中国古代皇帝制度的影响?中国中古历史中最特殊的皇帝当属武则天。她不仅以女身称帝,并将“佛教转轮王”纳入皇帝尊号。武则天尊号的每一次变化,都浓缩地反映了她在政治上前进的每一步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从“金轮圣神皇帝”这个尊号起,佛教的理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皇帝号中。而且作为女性,武则天是没有办法称天子的,天子乃上天之子,男性色彩至为明确。现存史料似乎没有发现武则天有过称天子的记录。您如何认识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带来的这种特殊皇权形态?

金子:您这里提出的通过武则天的尊号推断她无法称天子的个人见解很有意思,不过我想在这里主要还是谈谈一般性的问题。在讨论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之前,我认为虽然儒佛道并称三教,但儒教不应被看作宗教以与佛教、道教并列。现在在中国各地都有寺庙和道观,有着许多的参拜客,但到文庙和武庙参拜的人则寥寥无几。佛教和道教都是一般庶民的信仰对象,而儒教的史迹则不能直接成为信仰对象。

在唐代,武周时期的佛教影响,以及由建立太清宫为代表的玄宗朝时期道教思想的渗透等,都被指出是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但恐怕不能认为这些都渗透到了同时期对民众的统治方针中。在皇帝祭祀中,佛教和道教的因素都被引入,这也被佛教史和道教史研究者们所强调了,而且武则天为了正当化自己作为女性的统治,也曾经活用了佛教思想。可是,武后禁止在洛水的捕捞行为,是因为从洛水中发现了刻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瑞石,而在武周时期也没有禁止过食肉。一旦考虑到以一般人为对象的全国统治,我认为没必要过度重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关于皇帝和天子的二重性,需要慎重地予以考虑。在武则天登上政治舞台时,就开始在皇帝号前加上各种各样的称号(尊号、徽号),特别是在武后时期,还加上了佛教式的尊号。可是,加尊号这一举动并不仅见于中宗之后的唐代,也见于之后的宋、元、明、清,不过后来的尊号只加于皇帝号上,而且也不再采用佛教用语。由此,虽然不需要因为武后只有皇帝号有所变化,就认为她并未拥有天子号,但这一点正如下述,对于思考皇帝号和天子号的差异上有所启发。另外,直到隋代为止,大多数皇帝都以文帝、炀帝之类的帝号(谥号)来称

呼,但唐代以后各王朝的皇帝都多以太宗、玄宗等庙号来称呼。这或许是因为从唐代开始,基于在位时期尊号的谥号变得越来越长,相对的庙号还维持在二到三字左右。

虽然到现在为止都尚未涉及,事实上皇帝号、天子号在国际关系上也会用到。由中国出示给各国的国书中,用到皇帝称号的场合,基本上都是用“皇帝致书”、“皇帝敬问”、“皇帝问”这三种,用到“天子”的场合只有一个,可以说是例外。而就算是国书,也不过是对国内臣下所用的诏敕的延长,除了“皇帝致书”以外,其他用法在对象为国内的个人的诏书里也会用到,若没有皇帝自称,则在开头记有“敕”字。相对的,异族发给中国皇帝的国书则多用“天子”,《宋书·蛮夷传》《梁书·诸夷传》所见,有“常胜天子陛下”、“宋国大王大吉天子足下,敬礼”、“扬州阎浮提震旦天子”、“大吉天子足下”等例子,有很多加上“常胜”、“大吉”这样的形容词的称呼。东南亚和印度诸国寄往南朝的国书也有很多佛教式的表达,也有很多研究者认为这些对汉译佛典的用语有所影响。我本人对佛教典籍并不熟悉,因此之后要多加注意在异民族国书中的天子用例,而在皇帝的自称表达和来自外国的称呼之间,皇帝和天子的称号的样式有着巨大的差别,对此有必要多加注意。

另外,西嶋定生氏在《皇帝支配的成立》(译注:收于其《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中)的“玉玺分类表”中,举出了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的用例,指出了其有着相对应的角色,鲜明地展示了“皇帝”与“天子”的角色区分。皇帝号和天子号,在唐代皇帝祭祀的祝文里的自称中也明确地有所区别,皇帝号和天子号的不同在唐代为止的各王朝都得到贯彻,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收集直到唐代为止的正史中所见与皇帝相关的玺的用例,会发现完全没有出现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从皇帝三玺和天子三玺的用法规定来看,天子三玺本应主用于对外国的场合,但在国书的实例中,除了隋代的一个例子,皇帝从未自称为“天子”。关于这点必须详细研究。皇帝号和天子号之间以皇帝号为重点,天子号用于表明天和皇帝(天子)之间的联系,这样的理解虽然普通,但还是比较基本的吧。

## 未经过细致的实证就叙述自己意见的论著实在太多了

吕:在谷川道雄先生主编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1997年)一书中您曾说:“(在探讨中国古代君主特质方面)有待探明的问题远远多于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其理由之一就是在中国方面几乎还没有值得参考的研究成果。”现在,中国从事礼仪和国家祭祀研究的学者很多。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觉得在中国方面,有关这个课题研究的现状怎样?

金子: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详细回答。从我对这方面超过40年的研究的立场看来,未经过细致的实证就叙述自己意见的论著实在太多了。在我开始研究之前,也有学者曾在论文中涉及过皇帝祭祀的研究。可是,若只是把祭祀礼仪的例子单独举出来,那么什么样的解释都是可以加进去的。正如前述,我为了论证唐代皇帝亲祭的事例在《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通典》《唐会要》等史料所记载的例子外再无他例,或者说认为再无他例也没问题,而发表了前述的《唐代皇帝祭祀的亲祭与有司摄事》,在此基础上还参照大赦文等对唐代个别事例的目的进行了考察。在有司摄事的制度尚未确立的南北朝时期,我感觉到从《唐代皇帝祭祀的亲祭与有司摄事》得到的方法并不适用,所以在研究从东汉到隋的皇帝祭祀时是搜集个别用例来予以考察。

并不仅限于历史学,在进行自己的研究时,必须明确自己在使用什么样的方法论,并且也必须认识到自己方法论的极限和缺点。特别是在把祭祀礼仪的材料作为解释政治史的材料而运用时,为了不陷入恣意解释的境地,必须细心留意。比如说,同样是举出唐代皇帝亲祭的一个例子,在知晓唐代全体用例的前提下举出例子,和对其他用例一无所知唯独举出这一个例子,这两种做法得到的论证的准确性肯定完全不同。有着不断磨练提升自己方法论的自觉,以及时刻意识到这一方法论的极限,还有不断努力扩展自己的视野,我强烈希望各位,也包括日本的年轻研究者,能够做到这些。

吕:据说2010年您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授课期间,曾经说到您最喜欢的中国历史学家是唐长孺先生。不知

道唐长孺先生对您的研究有什么影响?

金子:正如开始所述,在我开始研究的时候,来自中国的刊物和专著非常有限。1975年我在四国的高知大学就职,当时在东京和京都以外的其他地区,能够得到的文献就更有限了。在这样有限的阅读中,我从唐长孺先生的论文背后感受到了厚重的积累,能够安心地进行研读。当然,除了唐长孺先生之外中国也有着许多硕学的先生,但在我年轻的时候,能够比较容易得到的论著中,接触唐先生的研究的机会更多。

不过,在中国的硕学先生们,常常基于自己巨量的知识积累,仅对合适的史料进行简要的提示,很少会像我这样把史料网罗式地列举出来,或者引用大段的史料。在当时的高知大学,除了我之外的中国史研究者还有安田二郎先生(之后就任东北大学文学部教授)以及接任他位置的窪添慶文先生(之后就任御茶水女子大学文教育学部教授),两位的研究都是细致而绵密的。在日本首都地区以外的大学,和日本史研究者的交流机会很多,或许不止是我,两位先生的研究也受到了日本史研究者的研究方法相当大的影响。

吕:我们知道金子先生2013年主持完成了《大唐元陵仪注新释》一书。不知道您现在在从事什么样的课题?有什么样的研究计划?

金子:我还没取得博士学位。在出版《中国古代皇帝祭祀研究》的时候,不是没考虑过申请博士学位,但因为对宋代之后的展望没有自信,就放弃了。不过,根据其他研究者后来发表的中国国家祭祀的研究,我认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是没错的。在这本书中也还有几个尚未检讨到的课题,也有几篇在中国发表了但在日本尚未发表的论文。我希望能够收集这些论文,再写一本关于到唐代为止的皇帝祭祀的专著。

另外,关于西嶋先生提出的册封体制和东亚世界的问题,我也想去检讨西嶋先生提出的框架的形式继续研究。关于东亚世界,日本研究者相当关注,时不时会有对我的索稿或者演讲邀请。关于这一方面的拙著《隋唐的国际秩序与东亚》(名著刊行会,2001年)已经绝版了,所以我在考虑把在刊行此书后有关古代东亚世界的拙论收集起来予以出版。

(中山大学历史系罗亮、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李雨丰译,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付晨晨、刘莹、吕博校)